

国际政治

试析冷战后的日澳安全关系

屈彩云

【摘要】自冷战结束以来,日澳沿着传统安全合作架构的轨道,积极加强双边安全合作,流露出构建军事同盟的意图。在相互依存与合作为主的当今国际社会中,日澳构建军事同盟化的安全关系略显不合时宜。然而,这看似不入主流的日澳安全关系却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日澳作为亚太重要国家,其双边安全合作的发展态势对重建中的亚太安全格局有重要的影响。今后,日澳将继续推动双边安全合作向军事同盟框架发展,在亚太地区安全事务中发挥影响。

【关键词】日澳安全关系;美国因素;军事同盟;冷战后

【中图分类号】D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755(2011)03-0014-19

近几年,日澳加快双边安全合作的步伐,连续签署了《安全合作联合声明》和《军事防卫合作协议》,流露出构建军事同盟的意图。不论是美日澳印四国同盟的打造,还是美日澳韩联合军演的举行,都非常明显地反映了日澳安全合作的发展动向。作为亚太重要大国,日澳军事同盟化的安全合作不仅反映其国家安全战略动向,而且直接牵引着亚太安全系统的神经。随着亚太地区在国际体系中影响力的提升,以及美国战略重心的东移,日澳将继续加强安全合作以追求国家利益、实现国家目标。日澳密切的安全合作已引起了亚太国家的普遍关注。分析日澳安全关系发展脉络和动因,探析其对亚太安全格局的影响及发展趋势,是本文讨论的主要内容。

一、冷战后日澳安全关系的发展演变

日澳在20世纪上半叶世界格局的裂变与整合中,从英日同盟下的合作走向法西斯与反法西斯的战争对决。战后,日澳加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成为美国主导的冷战间接盟友。虽然,1951年《旧金山合约》的签订使日澳关系得以恢复,但澳大利亚对日本仍持怀疑和敌视态度,拒绝美国提出的关于其与日本组建直接同盟的提议。1976年,日澳冰释前嫌,签订《友好合作基本条约》。在配合美国遏制共产主义方面,日澳进行了沟通与合作。20世纪70年代中期,日澳开始情报交流方面的秘密安全合作。^①80年代,日澳在环太平

洋经济构想方面进行广泛合作。随着双方政治、经贸关系的深化和冷战的结束,日澳开始寻求安全合作。1990年,澳国防务副部长保罗·迪布访日,就提高防卫关系和建立平等制度以推进防卫对话等问题与日方进行协商。同年5月,日本防卫厅长官石川要三对澳回访,标志着两国正式在安全领域开展合作。

冷战后,日澳双边关系进入全面、综合发展阶段。其中,安全关系是日澳双方发展的重点。1995年,日澳签署《建设性伙伴关系联合声明》,强调两国在经济、政治、安全关系等方面有着共同利益,并将地区安全和防务合作纳入两国“伙伴关系之中”。^②这为双边安全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框架。作为间接盟友、政治伙伴的日澳开始加强安全与防务合作,构建安全伙伴关系。

首先,加强双边安全对话。自1995年后,日澳首脑及高层领导频繁互访,多次发表联合声明。1996年2月,日澳举行首次“政治与军事对话”会议,并将其定为年度磋商机制。这推动了双边安全关系向合作化、机制化方向迈进。1997年8月,日澳提出推进两国伙伴关系的议程。在2001年《日澳建设性伙伴关系悉尼声明》和2002年《日澳新的建设性伙伴关系联合声明》中,双方均强调基于相近的战略利益,深化双方安全、防务合作与对话。2003年9月,日防卫厅长官和澳国防部长签署《日澳防卫交流理解备忘录》,重申两国将加强高层交流、战略对话及高级官员互访以及反恐等新领域的防卫合作。澳国防部长希尔说“备忘录暗示

着双边防务与安全关系的日益加强。它也表明日澳双方对安全合作越来越重视。”⁽³⁾

其次 加强反恐中的安全合作。日澳在共同应对东帝汶危机中实现了安全合作。2001年后期,日本决定参加联合国对东帝汶的维和行动,为东京和堪培拉之间建立紧密的防务联系提供了机会。⁽⁴⁾自2002年以来,日澳两国在东帝汶重建中进行了有效的合作。而2001年“9·11”事件更为日澳安全合作提供了契机。日澳加入以美国为首的反恐战争,并投入到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后重建。2003年7月,日澳两国外长签署《日澳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联合声明》,规定双方在反恐上的协商与合作。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维和行动与人道主义援助中,日澳安全合作关系进一步增强。如伊拉克战争结束后,日本从2004年到2006年派遣近5500名自卫队人员援助伊拉克重建。2005年,澳大利亚派遣450名皇家军队人员,特别为在伊拉克重建中的日本自卫队人员提供保护。⁽⁵⁾

第三 积极推进美日澳三边安全对话。2001年7月,日澳在参加东盟地区论坛(ARF)时提出日澳美三方安全对话。同年8月,美国国务卿鲍威尔与澳大利亚外长唐纳会谈时再次提到三国安全对话的提议,并得到澳日的积极响应。2002年,美日澳三方安全对话启动,并一直保持在副部长一级。2005年,澳大利亚在美澳外长双边会谈中提出将会谈提升至外交部长级别,并敦促日本调用更多的技术专家和资源打击东南亚极端势力。2006年3月,美日澳三方安全对话升级为部长级别,形成华盛顿—堪培拉—东京太平洋轴心,⁽⁶⁾加强战略三角防御合作。

第四 加强联合军事演习。日澳积极参加亚太地区多国联合演习,增强海上援助对话与交流。2002年,日、美、澳、韩、新(加坡)五国在日本九州岛海域举行联合海上军事演习。2003年9月,澳、日、美、法在珊瑚海进行“保护太平洋”的联合演习。2006年4月,澳大利亚又发起“保护太平洋”的联合演习,集中于高空拦截辅助陆上活动,日、美、英等参演。

此外,日澳互相提高对方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2004年,日本在《防卫白皮书》中首次明确提出,“基于共同的民主、价值观,推进与澳之间的防卫交流,增进相互理解与信赖。”⁽⁷⁾2005年,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访日时称,“在亚洲,澳大利亚再没有比日本更好的朋友了。”⁽⁸⁾

在日澳双方的积极推动下,其安全关系不断升级,走向战略伙伴关系。2006年3月,澳大利亚外长和日

本外务大臣提出发展两国的全面战略关系。同年8月,澳大利亚外长访问日本期间,又重申加强澳日安全合作关系。日本给予了积极回应。至此,日澳就加强双边安全合作的重要性达成一致意见。2007年3月,日澳签署《安全合作联合声明》,强调双方与美国的共同战略利益和同盟关系,规定双方在军事演习和训练、交换战略情报、应对传统威胁与非传统威胁等领域,以及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框架内合作,确立了2+2(外长+防长)定期会晤机制。⁽⁹⁾同年6月,日澳举行首次2+2会议,将两国关系定位为“本地区不可或缺的伙伴关系”。2008年,日澳又将两国关系升级为“全方位的战略、安全、经济伙伴关系”。

随着日澳安全合作的深化,其军事同盟的雏形显而易见。在第二次2+2会晤中,日澳签署《军事防卫合作协议》,加强双方舰队支援、秘密情报保护等合作,其中规定日本自卫队进入大洋洲海域从事海上安保等活动时,澳大利亚有提供情报与后勤保障供应的责任与义务。⁽¹⁰⁾2009年12月,日澳两国首脑一致同意为缔结有关日本自卫队与澳大利亚军队相互支援条约而展开政府间磋商。2010年5月,日澳在2+2会晤中签署《军事防卫合作协议》,规定日本自卫队与澳大利亚军队在行动中可分享食物、水、燃料以及相互提供交通工具、住所、保养维护。⁽¹¹⁾这是自2007年以来日澳签署的第三份安全合作协议。而澳大利亚也成为继美国之后与日本签署类似协议的第二个国家。看得出,日澳正从各个方面进一步规范、夯实安全合作的内容。

二、日澳加强安全合作的动因

从冷战结束至今的20年中,日澳安全合作发展迅速,不断升级,构建军事同盟的意图非常明显。在多边安全合作已成为潮流的亚太安全格局中,日澳却沿着传统安全合作的轨道,构建军事同盟化的安全关系。可见,日澳安全关系已完全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双边合作与交流。日澳对双边安全关系的重视与加强,是基于多重因素的考虑和推动。

1. 追求国家利益是日澳加强安全合作的主要动因。

首先,日澳追求政治大国身份。日本自1967年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后,开始追求政治大国身份。1985年日本首相中曾根提出“战后政治总决算”,明确提出“政治大国”的国家战略目标。冷战后,日本政界相继提出“国际贡献论”、“普通国家论”、“美丽国家论”等论调,尝试着不同的路径推进政治大国化,突破

宪法,摆脱战后体系。比如,日本打着联合国维和的旗帜,促使自卫队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打着日美同盟的招牌,主导东亚,借船出海;打着“中国威胁论”的幌子,增加军费开支,加强军事实力。很显然,军事同盟化的日澳安全合作是日本推进政治大国所尝试的另一条途径。它不仅增大日本的军事威慑力,而且也是日本自由出入太平洋的通行证。澳大利亚作为英联邦成员,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冷战期间,澳大利亚在外交上紧密跟随美英,参与到世界众多的热战和冷战中,其行为也受到了许多国家的谴责。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澳大利亚进行新的国家定位,提出发挥大国作用、提高国际地位的诉求。20世纪80年代末,澳大利亚提出“中等强国论”,追求仅次于超级大国、并与德、法、日、中、印并列的政治大国身份。日澳军事同盟化的合作是澳大利亚向政治大国目标冲刺、步入政治大国行列的重要依托。

其次,日澳试图角逐亚太安全秩序中的权力,提升影响力。冷战后,以美苏对抗为特征的亚太安全格局走向瓦解。尽管在亚洲有东盟、东盟10+3、APEC、上海合作组织等许多区域组织,但亚洲没有一个有实权的组织。⁽¹²⁾推进政治大国化的日澳自然不忘角逐亚太秩序重建中的主动权,扩大影响空间。随着亚洲四小龙经济的腾飞和中国的崛起,曾为亚洲强国和领头雁的日本在亚洲的地位相对衰落,急欲提升在亚洲的影响力。与此同时,澳大利亚随着国力的日益增强,越来越多地参与亚洲事务,意欲提高在亚太的影响力。而双边同盟框架则是日澳提高地位和提升影响力的重要平台。因为,同盟不仅是一种合作模式与框架,更是权力建构的重要来源。同盟权力分为硬权力和软权力。⁽¹³⁾显然,日澳同盟化的安全合是其在亚太攫取硬权力和软权力的重要凭借。

最后,日澳意图防范中国。冷战后,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增强与经济低迷、改革未见成效的日本形成鲜明对比。自近代以来形成的日强中弱的局面已被改变,中日双强的局面已成为现实。中国的崛起为亚洲和世界带来了机遇,日本却视为挑战和威胁。日本在2006年的防卫白皮书中强调“中国已确实成为地区经济政治大国,关于其军事动向,已成为周边地区各国关注的目标。为了减少对中国的疑虑,中国提高国际政策和军事实力的透明度是非常重要的。”⁽¹⁴⁾与此同时,日本采取各种途径和措施,特别是以所谓的“自由与繁荣之弧”和“价值观联盟”对中国进行遏制。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更增加了日

本对中国的防范和戒备。澳大利亚尽管与中国的经贸合作有了很大规模的发展,但对于中国的崛起,仍未能改变冷战思维和地缘戒备心理。尽管日本前首相安倍和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分别强调“日澳安保合作没有围堵遏制中国的意图”,但几句简单的外交辞令又能有多大信服力呢?近两年,日澳在国防白皮书上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启动美日澳印四边安全对话,其防范和围堵中国,挤压中国战略空间的意图是很明显的。

2. 同质性是日澳加强安全合作的内在动因。

其一,日澳具有相似的地缘身份认同。日本是位于亚洲大陆东岸的太平洋岛国,澳大利亚是位于太平洋南端的世界最大岛国。根据麦金德地缘政治理论,世界的边缘地带有两个同轴的新月地带,一个是内新月形地带(或边缘新月形地带),另一个是外新月形(或海岛新月形)带。⁽¹⁵⁾日澳是属于亚洲大陆边缘地带的海岛国家。相似的地缘位置建构了日澳相近的地缘心理。一方面日澳有着强烈的海洋国家认同,崇信海洋国家应与海洋国家结盟,对抗陆地国家的海权论。近几年,日本政府提出了“海洋国家发展战略”。很显然,构筑日澳军事同盟是日本实现国家战略的重要一环。而搭着世界最强海洋国家美英便车的澳大利亚,自然很乐意加强与世界重要岛国日本的军事同盟化合作。另一方面,日澳身份认同的二元性使其在脱亚与入亚的钟摆中游离。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经历了“脱亚入欧”、“排欧主亚”、“脱亚入美”的身份认同与建构。在外交三原则中,日本既强调西方一员的身份,又注重亚洲一员的身份。冷战后,日本以“入美入亚”的方式进行双重身份建构。澳大利亚从成立时起至冷战期间,一直以英联邦成员、西方的一员进行着文化和心理上的认同建构。冷战后,澳大利亚开始考虑地缘身份,把自己重新确定为亚太国家,强调融入亚洲。然而,文化、价值观的差异使澳大利亚入亚之路并不顺利,被李光耀称之为“亚洲新的白色垃圾”,⁽¹⁶⁾被亨廷顿冠之以“幸运而又无所适从的国家”。⁽¹⁷⁾可以说,日澳同盟化的安全合作是其回归亚洲的信号,更是其以东西方桥梁的身份在亚太确立重要位置的支柱。

其二,日澳具有基本一致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认同。战后,日本在美国占领下进行民主化改革,确立了三权分立的议会制度,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上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保持一致。澳大利亚作为英联邦成员全盘复制英国模式。尽管日澳在人权问题上有一定分歧,但在民主主义、自由、法治及市场经济的认同上基本是一致的,而这正是同盟合作

的重要政治基础。2007年,安倍提出价值观外交,开展日美澳印安全对话与合作,打造价值观联盟,在亚洲推广所谓价值观。而澳大利亚也给予了积极响应。很显然,日澳联盟是日本价值观外交的重要一环,也是一贯标榜价值观的澳大利亚外交行为的具体表现。

其三,日澳具有共同的结盟倾向。追溯日本外交政策历程,结盟是一个不变的主题。注重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日本有着“与强者入伍”的历史传统和结盟情节。以20世纪为例,在100年的时间里,日本有长达75年的结盟历史,如从1902年至1922年的英日同盟,从1936年至1945年的德意日三国同盟,1952年后的美日同盟。特别是日美同盟已成为日本外交主轴。回顾澳大利亚100多年的发展道路,同样有着很深的结盟情节。尽管在1931年澳已成为内政外交独立自主的国家,但长期作为英联邦成员,已形成严重的对外依赖性和依附性,从战时澳美同盟走向战后澳美的长期结盟。澳大利亚在昔日世界帝国英国和当今世界霸主美国的庇护下,分享着盟约的实惠。日澳这种共同的结盟倾向,塑造了其安全合作取向。

3. 美国因素是日澳同盟化安全合作的直接动因。

日澳是冷战时期美国亚太战略部署的南北锚。冷战后,美国分别加强与日澳的同盟关系,1996年日美、澳美同盟的重新定义和巩固,再次确定了日澳在美国亚太战略中的功能和身份。早在小布什政府期间就暗示并怂恿日澳之间建立军事同盟,⁽¹⁸⁾服务于美国在亚太安全格局的战略部署。在美国的默许和主导下,日澳安全合作进一步深化。同时,美国强化与日澳的双边安全关系,并积极推动日美澳三边安全合作。因为在美国看来,那些有共同盟友而本身没有成为盟友的国家,比那些面对一个共同敌人而未能团结起来的国家,更有可能使系统失衡。⁽¹⁹⁾2007年2月,美国副总统切尼先后访问日澳,推动《日澳安全合作宣言》的出台。在该宣言中,双方一致确定共同的战略目标和安全利益代表了他们各自与美国的盟友关系。同年9月,首届日美澳三国峰会召开,讨论加强三国安全关系。军事同盟化的日澳安全合作是美日同盟和美澳同盟的补充,迎合了美国遥控亚太安全格局、维持亚太均势的战略考虑。事实上,日澳也乐意追随美国,充当美国在亚太安全格局中的实际制衡者,借助战略三角同盟确立其在亚太的主导地位。

三、日澳军事同盟化安全合作对亚太安全格局的影响

作为亚太重要大国,日澳安全合作态势和动向直

接牵引着亚太安全系统的神经。尽管日澳一再强调其在确保不断变化的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其军事同盟的构建是对冷战传统安全格局的回归,直接影响重建中的亚太安全格局。

首先,夯实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美国是冷战时期亚太安全格局的主要缔造者,构建美日、美韩、美菲、美澳新太平洋防御体系,形成遏制共产主义的包围圈,通过发挥双边、多边同盟的作用主导亚太。冷战后,美国在亚太的影响力和领导力有所下降。而欲称霸全球,美国通过继续加强美日、美澳等亚太国家双边军事同盟关系,新建美泰同盟、东南亚反恐联盟,构置三重岛链防御线遏制中国,维持其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确保其在亚太安全格局的主导地位。日澳是美国亚太岛链防御线的重要据点。在2006年发布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美国提到结盟战略,并称拥有众多盟国是美国最大的优势和资源之一,必须保持与日本、澳大利亚和韩国等长期盟友的密切合作关系。⁽²⁰⁾而在2010年发布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美国更是重申其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角色,并强调为维持稳定与和平越来越依赖重要的盟友和伙伴。⁽²¹⁾很显然,日澳军事同盟化的安全合作符合美国全球战略规划,是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延伸和扩展,更是美国打造铁三角同盟的最后一环。这将进一步促使亚太安全格局中权力分布的失衡。而日美澳战略三角同盟奠定了亚洲版北约的雏形,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亚太安全格局向传统安全框架的倾斜。

其次,阻碍亚太多边安全合作的发展。冷战后,亚太启动多边安全合作,并逐渐形成以东盟地区论坛(ARF)为第一轨、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CSCAP)为第二轨、香格里拉对话和东北亚安全合作对话为一轨半的安全合作对话机制。⁽²²⁾此外,以经济合作为主的APEC、10+3机制、10+1机制、东亚峰会和亚欧会议也涉及安全议题,形成亚太多边安全合作的重要框架或其补充。但是,亚太地区迄今为止没有形成一个覆盖全地区的多边安全制度,而且已有的多边合作制度化程度低、制度的作用十分有限、在向制度化发展方面困难重重。⁽²³⁾可以说,亚太地区最大的安全困境是同盟体系与多边安全合作的矛盾。日澳安全合作建构的军事同盟模式,作为一种双边主义,其存在及实践会成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建设进程中的离心力。更何况,日澳安全合作模式是对美国亚太同盟体系传统架构的补充和回归,直接制约、阻碍亚太多边安全合作的发展进程,挑战亚太多边安全合作制度模式的构建。

再次,增加亚太安全环境的不稳定性。亚太地区包括了国际体系中的主要大国,是世界上热点问题积聚的敏感地带。东盟地区论坛、10+3机制、东亚峰会等构成了亚太安全发展的主要架构,亚太国家都应是构建亚太安全框架的参与者和建设者。日澳不顾亚太安全环境的脆弱性,忽视或排除中国、俄罗斯、东盟来建构同盟安全共同体,搞对抗,给亚太带来安全困境。因为结盟之外的国家不会无动于衷甘愿接受现状,而会进一步加强军事实力保卫国家安全和维护在区域的权益。这意味着军事结盟将会导致新一轮军备竞赛和国与国之间无休止的猜疑和对抗。自2007年以来,日澳美已举行了三次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并试图构筑美日澳印四国同盟,遏制中国,操控亚洲安全格局。日澳军事同盟化的安全合作无疑给亚太地区增加了不稳定因素,不利于亚太安全环境的构建。

最后,加深亚太安全战略文化困境。随着冷战的结束,亚太安全格局的战略文化主要表现为以美国为主的同盟体系下的对抗型战略文化和亚太多边安全合作下的合作型战略文化。如遗留冷战色彩的东北亚地区表现出一种对抗型的霍布斯式文化,^[24]而东盟国家在东盟方式的基础上共同建构了合作型的战略文化。日澳欲构建的军事同盟,树立敌意与威慑,寻求对抗与遏制,体现的是一种对抗型的战略文化。很显然,日澳军事同盟化的安全合作加强了亚太安全格局的对抗型战略文化,进一步阻遏了亚太新生的合作型战略文化,特别是东亚安全共同体的构建。毫无疑问,东亚安全共同体的构建需要一种合作型的战略文化。然而,作为东亚共同体倡导者和推动者的日澳,却以自相矛盾的逻辑加强对抗型战略文化,进一步加深了亚太安全战略文化困境。

四、日澳安全合作的发展趋势

2010年,日澳首脑换届,新上任的菅直人首相和吉拉德总理都在积极推进日澳安全合作。10月16日,澳大利亚空中预警机首次飞临日本航空自卫队浜松基地进行交流。11月23日,日本外相与澳大利亚外长发表《日澳关于核军缩及核不扩散声明》,表示两国在实现“无核世界”方面进行合作。尽管日澳在捕鲸、贸易方面存在分歧,但并不会成为双边安全关系发展的阻碍。今后,日澳将会进一步加强和深化双边安全合作,并在美日澳三边安全框架和亚太地区事务中拓展空间。

首先,日澳安全合作继续向军事同盟框架发展。目前,日澳已在联合国维和、国际人道主义救援、联合

演习及其他行动中开展合作,并且在军事援助方面取得较大突破,从舰队支援、情报共享发展到后勤补给援助。日澳安全防务合作已进入新阶段,从非传统领域发展到传统领域。其中,海空安全合作将是日澳进一步推进的重要内容。今后,日澳将会继续加深双边安全防务合作的步伐,扩展合作范围,从各个角度夯实双边军事同盟架构,实现双方安全力量的整合,谋求亚太安全格局的主导权。

其次,日澳安全合作继续在美日澳三边安全框架中发挥功能。日澳一致认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仍然必不可少”,两国应在一个三边对话框架内就地区安全战略与美国盟友深化合作。可以预见,日澳安全关系将在配合美国反武器扩散、维和行动、开发反导弹系统,应对非传统威胁以及全球战略部署方面继续加深合作。与此同时,随着美国全球战略重心的东移,亚太前沿部署战略的推行,其对传统盟友日澳的依赖进一步加强。这意味着美日澳三边安全合作将会进一步加强。此外,日澳与世界最强海洋国家美国有共同的地缘政治特性。这有利于缓冲美日澳三方的战略分歧,减少三边主义的不确定性。目前和将来的地缘政治将导致美日澳安全合作的进一步加强。^[25]

最后,日澳安全合作将在亚太地区安全事务中发挥作用。日澳已在东帝汶维和、伊拉克、伊朗战后重建等亚太地区事务上进行了安全合作。而朝鲜半岛局势的紧张化,将为日澳插手亚太地区安全事务提供契机。近来,美日澳韩安全合作的动向非常明显,多次举行联合演习。而且,据日本《产经新闻》报道,日本自卫队与美澳韩军队开始秘密进行各种战略协商,应对东北亚安全局势,特别是牵制中国。^[26]由此看来,在美日澳印四边安全对话陷入沉寂之时,美日澳韩已有构筑新的四边安全框架的趋势。总的来看,干预亚太地区安全事务将是今后日澳安全合作发展的方向之一。

日澳基于各自的国家利益和目标,抛弃前嫌,由敌人转为伙伴。在推进和深化双边安全合作的过程中,日澳仍不能抛弃过时的冷战思维和结盟情节,发展军事同盟化的传统安全关系。这一安全关系不符合亚太主流发展趋势,直接影响亚太新安全格局的重建。在构建东亚共同体成为亚太共识的今天,作为倡导者的日澳却在构建双边军事同盟,这不能不令人担忧。

[注释]

(1) Desmond Ball, "Security Cooperation between Japan and Australia: Current Elements and Future Prospects", in Brad Wil-

- liams and Andrew Newman, *Japan, Australia and Asia—Pacific security*,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 164.
- (2) Alan Rix, *Australia-Japan Political Alignment: 1952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 40.
- (3) Senator the Hon. Robert Hill, Minister for Defence, “Australia-Japan Defence Relationship”, media release, Canberra, 29 September 2003, in Brendan Taylor, *Australia as an Asia—Pacific Regional Power: Friendship in Flux?* Abingdon, Ox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 52.
- (4) David Walton, “Australia and Japan: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in James Cotton and John Ravenhill, *Trading on Alliance Security—Australia in World Affairs 2001–2005*,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81.
- (5) Brendan Taylor and Desmond Ball, “Australia-Japan”, in Brendan Taylor, *Australia as an Asia-Pacific Regional Power: Friendships in Flux?* p. 53.
- (6) Purnendra Jain and John Bruni, “American Acolytes: Tokyo, Canberra and Washington’s Emerging ‘Pacific Axis’”, in Brad Williams and Andrew Newman, *Japan, Australia and Asia—Pacific Security*,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 89.
- (7) [日]日本防卫省编《防卫白皮书 2004 年版》[EB/01]。http://www.clearing.mod.go.jp/hakusho_data/2004/2004/index.html。
- (8) “Transcript of the Prime Minister the Hon John Howard MP address to the Lowy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 ‘Australia in the World’” [EB/01], Apr. 5, 2005, see http://au.chineseembassy.org/eng/xw/t190220.htm。
- (9) [日]日本外务省编《日澳安保合作宣言》[EB/01]。http://www.mofa.go.jp/mofaj/area/australia/visit/0703_ks.html。
- (10) [日]日本外务省编《日澳外长、防长第二次会谈共同声明》[EB/01]。http://www.mofa.go.jp/mofaj/area/australia/2plus2/0812_ks.html。
- (11) [日]日本外务省编《日澳签署后勤援助协定》[EB/01]。http://www.mofa.go.jp/mofaj/press/release/22/5/0519_04.html。
- (12)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M], 王义桅等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第 393 页。
- (13) 张景全《观念与同盟关系探析》[J], 《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 年第 9 期。
- (14) [日]日本防卫省编《防卫白皮书 2006 年版》[EB/01]。http://www.clearing.mod.go.jp/hakusho_data/2006/2006/index.html。
- (15) [英国]杰弗里·帕克《20 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M], 李亦鸣等译, 解放军出版社, 1992 年版, 第 19 页。
- (16) [17]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 周琪等译, 新华出版社, 1998 年版, 第 165 页。
- (18) John Chan, “Japan-Australia security declaration strengthens US encirclement of China”, Mar. 23, 2007, see http://www.wsws.org/articles/2007/mar2007/ausja-m23.shtml。
- (19) [美]罗伯特·杰维斯《系统效应: 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复杂性》[M], 李少军等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8 年版, 第 255 页。
- (20)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http://www.defense.gov/qdr/report/Report20060203.pdf。
- (21)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http://www.defense.gov/qdr/images/QDR_as_of_12Feb10_1000.pdf。
- (22) 杨丹志《亚太多边安全合作机制: 现状及其前景》[EB/01]。http://yataisuo.cass.cn/xueshuwz/showcontent.asp?id=1138。
- (23) 汤继强《美国的同盟体系对亚太安全合作的影响》[J],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 年第 3 期, 95 页。
- (24) [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 秦亚青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第 255–256 页。
- (25) Brendan Taylor and Desmond Ball, “Historical overview”, in William T. Tow, Mark J. Thomson, *Asia-Pacific Security: US, Australia and Japan and the New Security Triangle*, New York, NY: Routledge, 2007, p. 16.
- (26) [日]《日美澳战略协商冲击着日美同盟的根基》[EB/01], 《产经新闻》2010 年 11 月 8 日。http://sankei.jp.msn.com/politics/news/110119/plc11011914570138-n1.htm。

作者简介: 屈彩云,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日本研究系国际政治专业 2008 级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102)

收稿日期: 2010-12-08

修改日期: 2011-03-19

CONTENT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 1 American Hegemony in Declin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vision of 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 for Free Trade
by Shen Benqiu
Since 2007 there have been many disputes concerning whether the U. S. hegemonic status has declin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vision of 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 this paper presents an analysis of U. S. ability and willingness in the provision of public good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The findings are summarized as the following: in recent years, in the negotiations on establishing global multilateral trade mechanism, the United States has failed to play a leading role; U. S. willingness to provide public goods has shifted from global level to regional level; in addition, it does not tolerate free ride as much as before. Therefore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U. S. ability and willingness to provide 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 have decreased; hence, its hegemonic power is declining.

- 8 The Strengthening and Dilemma of U. S. Homeland Security Protection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Anti-Terrorism —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Aviation Security
by Wang Jimei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the protection of U. S. homeland from terrorist attacks has become the core of U. S. security strategy. The U. S. government has strengthened homeland security protection measures comprehensively. However, obvious vulnerabilities still exist and the U. S. government faces inescapable challenges and dilemma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aviation securit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trengthening and dilemma of U. S. homeland security protection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Anti-Terrorism.

- 14 The Construction of Japan-Australia Bilateral Security Relation Ship After the Cold War
by Qu Caiyun
After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Japan and Australia have been actively strengthening bilateral security cooperation along traditional security cooperation framework with the intention of building military alliance.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ith the mainstream on interdependence and cooperation, the military alliance of Japan-Australia security relationship is rather inappropriate. However, security cooperation between Japan and Australia is based on the consideration of many factors. As important powers in the Asian-Pacific region, Japan-Australia security cooperation development will exert direct and deep impact on the rebuilding of the Asian-Pacific security pattern. In the future, Japan and Australia will continue to promote bilateral security cooperation toward military alliance, and play a role in security affairs in the Asian-Pacific regi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20 The Integration of European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Mechanisms after the Entry into Force of the Treaty of Lisbon
by Zhang Hua
The Treaty of Lisbon stipulates that the EU shall accede to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ECHR'), which ends the lasting controversy perplexing the EU legal system, and predicts the integration of the two European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mechanisms. Due to the lagging behind of EU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mechanism, EU's accession to the ECHR has become urgent and necessary. With an aim to uphold the autonomy of EU Law, the 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 ('ECJ') once gave a negative answer to the EU's accession in the early 1990s. However, in practice the frequent interplay between ECJ and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demonstrates the necessity of EU's accession. The Lisbon Treaty has provided sufficient legal basis